



郭嵩焘洋务观研究

李新士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郭嵩焘洋务观研究

李新士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郭嵩焘洋务观研究 / 李新士著. — 郑州 :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215-08773-6

I. ①郭… II. ①李… III. ①郭嵩焘(1818~1891) - 思想评论 IV. ①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85720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65788051)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 7.375

字数 190 千字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0.00 元

前言

郭嵩焘，学名嵩焘，字伯琛，号筠仙，湖南湘阴人。因太平军进攻湖南时，曾避居湘阴县城东玉池山，又称玉池山农，晚年更号玉池老人。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三月初七日生於湖南湘阴县城西一个家道中落的商人兼地主家庭，光绪十七年（1891）六月十三日卒，享年74岁。

郭嵩焘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进士。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攻入湖南。郭嵩焘因母亲去世，丁忧家居，与左宗棠避乱玉池山。本年秋天，太平军围长沙，因胡林翼推荐，湖南巡抚张亮基数次礼聘左出山入幕，左犹豫难决，郭力劝左宗棠出山。本年冬，太平军占领武昌，清政府命曾国藩办理团练，曾以丁忧为由，不愿承担此项大任。郭嵩焘力劝其仿古制“墨经从戎”。湘军建成，出省作战，郭嵩焘入曾幕府，但始终不领薪水，不求保荐。湘军初建，军饷奇缺，朝廷又无力给予分文。郭嵩焘提出“筹饷三策”，即劝捐、厘捐和盐捐。湘军以此解决军饷，“支柱东南数省”。^① 咸丰三年（1853），郭嵩焘随湘军赴江西驰援江忠源，南昌解围，郭因军功授翰林编修。咸丰七年（1857），郭嵩焘北上赴京供职，八年冬（1858），入值南书房。咸丰九年春，奉旨协助曾格林沁去天津办理海防。

^① 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1971年版，第44页。

不久调烟台查办厘税,后被僧格林沁参劾,回京。咸丰十年春,辞职回乡。同治元年(1862)秋,赴李鸿章之邀,出湘去上海任苏松粮道。任职期间,促成曾、李上奏《请减苏松太粮赋浮额》的奏折,此奏使苏松“五百年民困,一旦以苏”^①。郭在沪任职期间还参与上海外国语言文字馆的创办。同治二年三月,朝廷又任命郭嵩焘办两淮盐运使。六月,诏命署广东巡抚。郭嵩焘与两任总督都有矛盾。朝廷令左宗棠查办此事。左宗棠推荐亲信蒋益澧做广东巡抚。同治五年(1866)五月奉诏辞归。在乡8年,主编《湘阴县志》和《湖南通志》,掌教城南书院,总结洋务经验,编辑《绥边征实》一书。

在光绪元年(1875),因日本借琉球渔民被台湾生番所杀事件,进犯台湾。朝廷重新启用懂洋务的人才,郭嵩焘因被称为“洋务实是精透”,^②被重新启用。二月,被任命为福建按察使,呈上《条议海防事宜》,首次表达了自己的自强思想的本末观,认为要自强首在朝廷政教有所改良。七月,他被朝廷选为出使英国大臣。光绪二年十月赴英,光绪四年正月,兼任驻法大臣。因与驻英副使刘锡鸿矛盾重重,清廷命曾纪泽代替他为驻英大使。在英期间细心考究西洋富强本末,这为他融合中西的改良思想的形成,积累了宝贵的第一手材料。郭嵩焘在光绪五年(1879)回国归乡,投身湖南教育,首倡恢复湘水校经堂,创办思贤讲舍,目的在于“讲求征实致用之学,以求有益乡里,为陶成人才之资”^③。为改变湖南人心风俗,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对近代新学的初步构建有重要的影响。

郭嵩焘一生著述颇丰,有40多种,达数百万字,已刊刻流传的有:《会合联吟》1卷,《罗忠节公年谱》2卷,《使西纪程》2卷,《罪言

① 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版,第249页。

② 郭嵩焘:《郭嵩焘嵩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③ 郭嵩焘:《郭嵩焘嵩日记》(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9页。

存略》1卷,《礼记质疑》49卷,《大学章句质疑》1卷,《中庸章句质疑》2卷,《校订朱子家礼》5卷。这几种在郭嵩焘生前已刊行。在他去世后陆续刊行的著作有:《郭侍郎奏疏》12卷,于光绪十八年(1892)由养知书屋刊刻。1983年,以《郭嵩焘奏稿》为名,由岳麓书社出版。《养知书屋文集》和《养知书屋诗文集》,光绪十八年(1892)由养知书屋刊刻,1984年岳麓书社将两集合订一册,题名为《郭嵩焘诗文集》出版。《玉池老人自叙》1卷,于光绪十九年由养知书屋刊刻,台湾文海出版社于1971年以同名印行。《周易释例》1卷,《毛诗余义》2卷,《绥边征实》24卷,《慎终录》1卷,《思旧录》1卷,《嘉言录》1卷,为郭嵩焘佚书六种,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养知书屋刊刻。《史记札记》5卷,民国年间曾出版。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重印此书。《郭嵩焘日记》4册,湖南人民出版社于1983年全部出版,共200万字。

回顾100多年来对郭嵩焘的评论和研究,呈现的是冷热不均的复杂状况。郭去世后,李鸿章根据王先谦、周开铭等人的一个联名公呈,向朝廷写了一个奏疏,希望朝廷给予纪念并赐谥。疏中对郭嵩焘的生平事迹作了一番详述,特别突出地介绍了他在与太平军斗争中的事功,同时肯定了郭氏的《礼记质疑》等学术成就,认为郭“文章负天下重望,于学无所不通,而尤善言礼”^①。李鸿章对郭的评价应该是全面和公允的,但朝廷认为,郭嵩焘所著书籍颇招物议,拒绝了请求。郭以先知先觉者来启发后者,目的在于“利在国家”;郭出使海外,受到广泛赞誉,却被乡里咒骂。王先谦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人心积蠹”^②,就是说中国人人心险恶,不辨是非。所以他给郭的挽

① 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文海出版社1971年版,第10页。

② 王先谦:《葵园四种》,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187页。

联是“赤胆忠肝筹国是，谤满天下无损名”^①。

郭嵩焘生前虽然饱受误解和谩骂，逝世后却被不少人称赞。阎镇珩在《兵部侍郎湘阴郭公诔》中说：“予独怪谤公者呶呶而不止，恐其心迹更久莫白，且重为盛德之累也，故为之词以疏其隐，以待后有知公者定论焉。”^②王廷浩等人的挽联为：过化谢汾阳世业，立学先，立功后，抚等身浩卷，始识中朝元老，更留千古文章。^③

在接下来的时期里，郭嵩焘也不断被人评论，谭嗣同对郭的评价很高。他说，中国十八行省，只有湖南以仇视洋务而著名，而当时被世人所熟知的最懂洋务的人又以郭嵩焘和曾纪泽为最，认为此二人可为湖南增光，但湖南人竭力诋毁二人，可谓怪事。^④1903年问世的《新湖南》认为，郭嵩焘远接船山，近袭魏源，把湖南独立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发人所不敢发。^⑤梁启超认为：“当时最能了解西学的是郭筠仙（嵩焘），竟然被所谓‘清流舆论’者万般排挤，侘傺以死。这类事实，最足为时代心理写照了。”^⑥梁启超从思想史角度，认为郭嵩焘是当时最了解西学的人。

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以前，专门研究郭嵩焘的著作只有寥寥数篇。1937年7月出版的《史地杂志》的创刊号上发表了柳定生的《郭嵩焘传》，文章从四个方面分析了郭嵩焘有关中外交涉的思想：一，议论交邻之道，谓当一秉至诚，不可再以夷狄对待；二，洋务应以办实业为主，认为兵制为次；三，对待教案，尽祛客气，要分辨民教

① 《玉池挽词汇编》卷二，光绪十九年养知书屋刻本，第5页。

② 《玉池挽词汇编》卷一，光绪十九年养知书屋刻本，第2页。

③ 《玉池挽词汇编》卷二，光绪十九年养知书屋刻本，第35页。

④ 《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3~174页。

⑤ 张楠、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617~618页。

⑥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89页。

的良莠之别,此为弭衅根本方法;四,对外交涉不主构兵。^① 蒋廷黻认为:郭嵩焘出使回国后,是全国最开明的一个人,他对西洋的认识远在李鸿章之上,但是人们反对他,使他以后全无机会做事,只好隐居湖南从事著作。^②

楚金在1940年《中和月刊》第1卷第12期发表的《郭筠仙手札并跋》指出:筠仙侍郎为同治中兴名臣中主张维新最力之人;中国近代外交家奉郭为开山祖师;使公十年不死,其必为中国维新运动之领袖无疑。楚金还分析了梁启超所说的“清流舆论”:“自光绪庚辰(1880)以后,清流以大言取快,几成习气。专以误国之罪委诸清流,固属过当,然始则清流与清流争……终成鱼烂之局,清流诸公躁暗虚骄,诚不能不任其咎也。语曰: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反复郭公之论,回思六十年来史事,怆恨何极!”^③ 沧海在《雄风》杂志第1卷第5期上发表的《郭嵩焘先生》着重论述了郭嵩焘在对外政策上的才识。认为如果郭的建议能被采纳,清朝这只纸老虎还不致被完全戳穿,国际上的地位也不致如此降落。^④ 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钱基博的《近百年湖南学风》、李肖聃的《湘学略》均有专门章节论述郭嵩焘。钱基博介绍了郭嵩焘的“西洋立国有本有末”的进步西学思想,李肖聃则说,郭嵩焘的“于泰西所以富强之故洞若观火,盖其读书观理,有以知西方文化之大原,而不惑于南宋以来七百年流俗之论,其识高出于群公之上,故当时拘学小生群起而攻之”。^⑤

在改革开放以前,大陆对郭嵩焘进行系统研究的论著比较少。

① 转引自王兴国:《郭嵩焘研究著作述要》,湖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3页。

②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70页。

③ 转引自王兴国《郭嵩焘研究著作述要》,湖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3页。

④ 转引自王兴国《郭嵩焘研究著作述要》,湖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3页。

⑤ 李肖聃、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96~197页。

台湾在1971年出版了由郭廷以先生编定的《郭嵩焘先生年谱》，海外于1978年出版的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一书，该书将王韬、丁日昌、郑观应、郭嵩焘等人均列为改革家。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派人士认识到了中国面临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使中国遇到了挑战的机遇，又说：“郭嵩焘认为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必须了解外国人，为了把握时机，就必须学习外国的方法。在处理夷务时中国人应考虑外国人的动机和各种现实，而不应只考虑原则。在19世纪60年代，他已经在进行探讨，以期超越技术的范围对西方的力量取得更深入了解”。^①

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时期之后，学术界对洋务运动重新进行了审视，而作为洋务思想家的郭嵩焘因而为人们重视。

其一，郭嵩焘的著作得到整理编辑出版。不仅《郭嵩焘诗文集》《郭嵩焘奏稿》《使西纪程》《礼记质疑》等过去已刊著作重新出版，《郭嵩焘日记》也整理成四大卷相继出版。这为研究郭嵩焘，特别是他的对外开放思想，提供了比较丰富的资料。

其二，出版了几种研究郭嵩焘的学术专著：曾永玲著的《郭嵩焘大传》，此书是国内第一本比较系统地研究郭嵩焘的学术著作，把郭嵩焘放在时代背景下，对其一生的经历和事业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分析，对其功与过进行了评价，观点鲜明，但某些评论不免带有时代的烙印。

汪荣祖著的《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汪荣祖为美籍华人。本书将郭嵩焘的一生放在道咸同光时代中来观察。既由时代展现人物，复由人物印证时代，认为郭在那个时代并非顶尖人物，他崛起于咸同之际，然而咸同将相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

^①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7页。

章等人,声名远过于他,事实上他生不在咸同将相之列,死亦得不到朝廷赐谥。他虽可称为自强运动中一员健将,与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楨、丁日昌等公私交均密,亦曾得到恭亲王奕訢、军机大臣文祥,甚至慈禧太后的赏识,但是他的实际贡献不大。原因是他成为那个时代中最具有争议性的人物,时代的主流容不了他,他亦不肯随俗浮沉,屡经挫折后,只好投闲置散,壮志不酬。作者认为,就争议性而言,郭嵩焘远远超过时贤,曾、左、李都不能相比。这正反映了其思想的敏锐,以及对西方认识的深切,达到遭忌、遭骂的程度。正由于这份敏锐与深切,他肯定中国必须接受巨变后的现实,以便从改变中求自强。但是当时极多的士大夫昧于时事,不知应变,以致盲目拒变。他寡不敌众,只好靠边站,然而他个人的挫折正好象征着中国走向世界的挫折。^①

王兴国著《郭嵩焘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作者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此书是目前我国内地最全面研究郭嵩焘思想的学术著作。全书立足于全面解读郭嵩焘原著,深入文本,细致地归纳了郭嵩焘政论、自强、外交、军事、经济、哲学、经学考据、伦理、教育科技、文学艺术思想。在研究中作者除了分析其独到的思想见解和贡献外,还特别注意探讨他在这些领域如何首开中外文化交流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之风气。^②张静著《郭嵩焘思想文化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此书为作者的博士论文的修订。作者认为,郭嵩焘的中西文化观与文明观在当时社会产生了较为强烈的反响,有的即被纳入现行社会结构的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并形成政策。作者认为,湘军事业是郭嵩焘一生事业的根本,也是其思想文化

① 王荣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4页。

② 王兴国:《郭嵩焘研究著作述要》,湖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8页。

的载体。还认为,郭嵩焘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其阶级局限性,其思想来源是他始终宗奉的有别于宋明理学的王船山哲学。^①

吴以义著《海客述奇》一书,台北三民书局2002年版。本书的核心人物是郭嵩焘。本书实际意图是通过中国首批进入西方的读书人对西洋文化的观感,揭示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科学早期相遇时所产生的反思,由此探讨科学本身的内涵,反思近代科学没在中国生根发芽以及科学文化如何得以在后发国家传播的问题。

其三,出版了一本通俗传记和四本文学传记。一本通俗传记是《郭嵩焘》,危兆盖编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将该传记作为“爱国主义教育丛书”之一,全书3万字。四本文学传记是:范继忠著《孤独前驱——郭嵩焘别传》,为李玉刚主编的“近代名士别传丛书”的一种;李全安著《郭嵩焘》(上下册),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年9月出版;崔宝通著《郭嵩焘》(全二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社;州长治著《郭嵩焘》,云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

其四,1999年11月22日至24日,在湖南岳阳第一次召开郭嵩焘生平与思想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由湖南岳阳市人民政府、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岳麓书社、湘阴县人民政府、岳阳市社科联等单位联合发起,会议收到论文60多篇。

根据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统计,从1979年至2012年,大陆学术期刊发表研究郭嵩焘的论文共有343篇,加上郭嵩焘生平与思想研讨会提交的论文60多篇,共计400多篇,其中硕士论文18篇。

从已发表的论文内容分析,它们涉及郭嵩焘的生平大事、人事交往、政治思想、洋务思想、外交思想、文化思想、经济思想、教育思想、哲学思想等方面。

^① 张静:《郭嵩焘文化思想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第一,对郭嵩焘的总体性评价。

熊月之的《论郭嵩焘》(《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4期)是新时期第一篇较为全面地评价郭嵩焘的文章。该文可分为三个小部分,第一部分叙述郭嵩焘参与镇压太平军和出任驻英公使两件大事。第二部分指出郭嵩焘与洋务派的关系,指出郭嵩焘以其敏锐的眼光超越了只在器物层面徘徊的洋务运动。第三部分分析了郭嵩焘悲剧的原因。钟叔河的《论郭嵩焘》(《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将郭嵩焘定位为“孤独的先行者”。马春庆的《郭嵩焘思想评价》(《文史哲》,1987年第4期)把郭嵩焘定位为地道的“买办外交官”,而且是最具有半殖民地洋奴性格的典型人物,不能认为他遭到顽固派的谴责就把其定位为爱国者。

吴义雄的《洋务运动的批判者——郭嵩焘》(《学术研究》,1990年第2期)把郭定位自由资本主义的唯一的理论家。万登学的《天嘘晴风散云霾——毁誉交加的我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台湾《中央日报》1994年3月3日),该文对郭嵩焘毁誉交加的原因进行分析,对其复杂性作出了一家之言的评价,该文回顾了百年来郭嵩焘研究的发展历程,概括了有关郭氏研究中的有所争论的学术观点。田海林、宋淑玉合著的《郭嵩焘的历史定位》(《郭嵩焘与近代中国对外开放》,岳麓书社2000年版)把郭嵩焘定位为经世派的后劲,洋务派的智者,维新派的先驱。李喜所的《近代化史观与郭嵩焘的历史定位》(《郭嵩焘与近代中国对外开放》,岳麓书社2000年版)以近代化史观去认识郭嵩焘,认为郭是中国近代著名外交家和启蒙思想家,他在夷夏观和本末体用观上超越了同时代的先进人士,称其为“思想的启明星”是当之无愧的。李立泉的《郭嵩焘简论》(《郭嵩焘与近代中国对外开放》,岳麓书社2000年版)一文认为,摒弃“华夷之别”,为国寻求自处之方,力主和平、平等外交;忍辱负重,出使英国,竭力维护民族尊严;主张全方位向西方学习,开维新变法思想先河。

这是郭嵩焘的思想和成就。岑生平的《郭嵩焘是什么派》(《郭嵩焘与近代中国对外开放》,岳麓书社2000年版),该文认为郭嵩焘是一个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先驱。徐立望的《郭嵩焘晚年思想研究》(《学术研究》,2003年第8期)认为郭嵩焘晚年严厉指责洋务运动出现的弊端,主张圣人之教与西方先进文化对照融合,重建秦汉以来失落了几千年的真正儒家圣人之治。

第二,关于郭嵩焘生平交往的研究。

郭一生足迹踏遍大江南北,喜爱交友游历,缘结多方人脉。

对于这方面研究成果主要有:企予著《肯容疑谤道才尊——朱克敬与郭嵩焘的思想交往》(《兰州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作者认为郭和朱是志同道合的挚友,思想都较先进,向往西方文化,而对各方的诽谤,他们相互激励,正视现实,与顽固势力做不懈的斗争。刘学照的《郭嵩焘与李鸿章的交谊述论》(《郭嵩焘与近代中国对外开放》,岳麓书社2000年版),文章论述了郭与李从同年到僚属,从洋务同道到政治知音,考察郭李交谊,了解他们个人的政治识见和思想风貌,从一个特定的侧面反映了洋务运动的复杂性,凸显洋务潮流波澜起伏的全息投影。王漕华的《曾国藩与刘蓉、郭嵩焘交谊考论》(《郭嵩焘与近代中国对外开放》,岳麓书社2000年版),顾琪《郭嵩焘、左宗棠交恶考述》(同前),钟叔河的《郭嵩焘和严复》(《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10期),李郝亚《相知与相离:王闿运与郭嵩焘之交谊探析》(《求索》,2006年第11期),贾熟村的《丁日昌与郭嵩焘的友谊》(《学术研究》,2003年第11期),这些论文从交往层面展示了郭嵩焘与当时的名人有着深刻的渊源,他们之间的互动构成晚清一大风景。

第三,关于政治、法律思想的研究。

黎志刚著文除了论述郭的经世思想,也论述郭知悉亚当·斯密和约翰·穆勒的经济思想,认为,对现代西方文明具有一定程度理解

的郭嵩焘与一直浸淫在传统学术氛围中的知识分子有所不同。^① 吴和庆、万里合写的《郭嵩焘政治思想发微》认为,郭嵩焘把国家得以治理与否的关键建立在君、臣、民关系是否理顺的基础上。陶用舒著《郭嵩焘、左宗棠爱国主义思想异同论》(《郭嵩焘与近代中国对外开放》,岳麓书社2000年版)一文认为,郭和左都为爱国主义,左宗棠在抵抗外国侵略方面功勋卓著,郭嵩焘的爱国主义表现在以和平的手段保存国力,不去做无谓争斗,重在外交智术取胜。张钦的《郭嵩焘的政治道德观》(《郭嵩焘与中国近代对外开放》,岳麓书社2000年版)一文认为:郭嵩焘遵循着传统儒家士大夫的人生道路,表现出强烈的济世情怀。他以人心风俗为切入点,使其政治道德观在洋务派中略高一筹,他对西洋人心风俗、“君民不相隔”的政体赞美有加,但没有要求清政府改弦易辙,效法西洋政体。

王国宇认为,郭嵩焘的民本思想一方面继承了中国古代民本主义的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吸收了西方民主思想的有益元素。^② 何培金的《郭嵩焘洋务思想中的民本观念》(《郭嵩焘与近代中国对外开放》,岳麓书社2000年版)认为“民本”观念是郭嵩焘整个洋务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同其爱国思想一道构成他的洋务思想的立足点。指出郭嵩焘关心民瘼,主张民贵君轻,重视科技、教育,关注人心风俗,关注全民族文化水准的提高。薛学共著《简论郭嵩焘的军事思想》(《郭嵩焘与近代中国对外开放》,岳麓书社2000年版)认为郭嵩焘不仅以擅长洋务、外交著称,在近代军事史上也有极为重要的一席之地,主张慎战柔武,为湘军的创建与发展积极谋划。孙训华认为,郭嵩焘由传统的“士”向近代政治思想家转化,他原有的“治官以严,

① 黎志刚:《郭嵩焘的经世思想》,《中国经世思想研讨论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

② 王国宇:《论郭嵩焘的民本思想》,《郭嵩焘与近代中国对外开放》,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328页。

治民以宽”的民本思想融进了“君民交相维系”的民主思想,形成新的民本思想,这种新的民本思想已经将传统的民本思想中的“水舟论”升华为“导航论”。^①

第四,关于外交思想的研究。

张浩的《郭嵩焘与曾纪泽外交思想之比较》(《清史研究》,1998年第3期)分析了郭曾面临的外交大势和外交共识。郭曾对传统的四夷观都持否定的态度,都持“和战观”。郭嵩焘的“和战观”可以归纳为“通商”“主和”,曾纪泽的“和战观”可以概括为“备战求和”。成晓军、张卫波《试论郭嵩焘的外交思想》(《郭嵩焘与近代中国对外开放》,岳麓书社2000年版)认为郭具有超越时人的近代外交意识,以“和”为主的外交原则,讲求实效的“应付之方”,倡议商战以致敌,运用国际公法,掌握外交主动权,“攘外必失安内”,借助西法以实现自强。李育民认为,郭嵩焘的外交思想是基于以下认识而形成的:郭嵩焘看到,中国面对的是个在各方面优于中国的手,面对清政府的“时悔时反”外交政策,主张根据国势强弱,因时度势确定外交方针。主张以诚信相孚去欺诈和虚骄,“疏通其情”,方能掌握御夷之道。^②易永卿认为,郭嵩焘把“理”当做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态度,“情”是处理对外关系的出发点,“势”是处理对外关系的策略方针。^③王丽对近五年郭嵩焘外交思想的研究作一总结,认为郭氏的外交思想以“主和”为原则,“主和”不等于“卖国”“投降”,是郭嵩焘基于对世界形势的正确认识,加上读书观史得出的结论,认为通情、顺势、达理是

① 孙训华:《郭嵩焘的君民维系思想探析》,《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4期。

② 李育民:《郭嵩焘外交思想简论》,《郭嵩焘与近代中国对外开放》,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236页。

③ 易永卿:《郭嵩焘处理对外关系三原则》,《郭嵩焘与近代中国对外开放》,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214页。

郭嵩焘外交思想的基本原则。对于郭外交思想的局限,作者认为他一味主张诚信外交,在弱肉强食的非理性社会不太现实。

第五,关于文化思想研究。

易惠莉认为,郭嵩焘的中西文化观独具特色,郭认为从传统文化的五个方面,即仁、义、礼、智、信而言西方都优于中国,西洋以民主立国,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西洋治民以法,中国治民以德,德治不及法;西洋以智力相胜,中国由周以来两千年对智无所究心。^① 张良俊认为,对比中西之后,郭嵩焘看到中国富强之基,不在坚船利炮,而在改变立国之本,学习西洋政教,用民主政治代替封建君主专制。^② 王艳玲《试论郭嵩焘的对外开放思想》(《郭嵩焘与近代中国对外开放》,岳麓书社2000年版)认为郭嵩焘的具体开放主张可分为:政治方面,学习西方政教;经济方面,学习西方先进技艺,发展近代工商业;对外关系,主张依据条约、国际惯例和公法行事;文化方面,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的教育制度。宋德华、张英智合著的《论郭嵩焘的西洋观与湖南文化》(《郭嵩焘与近代中国对外开放》,岳麓书社2000年版)一文认为,湖南文化是郭氏西洋观的思想基础。湖湘文化有通经致用的传统,务实的作风十分明显,关注现实,应时而动,郭把西方务实求真的学术精神融进湖湘文化,对湖湘文化的近代转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田永秀、鲜于浩认为,郭对西方的教育和文化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郭认为英国的强大与政府重视教育分不开,西方学校一切致为实用,不为虚文;中国二千余年沉醉于华夷观念的优越论中,处处务虚,是中国落后于欧洲的根本原因。^③ 谭承耕的《论郭嵩焘与传统文化》(《郭嵩焘与近代中国对外开放》,岳麓书社

① 易惠莉:《论郭嵩焘的中西文化观》,《学术月刊》,1987年第10期。

② 张良俊:《试论郭嵩焘学习西方的思想》,《安徽史学》,1994年第4期。

③ 田永秀、鲜于浩:《论郭嵩焘对西方文化的认识及对中国文化的反思》,《郭嵩焘与近代中国对外开放》,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46页。

2000年版)认为郭既继承了中国文化优秀传统,又大大超越了这个传统,开维新思想先河。

钟兴永所著《郭嵩焘对湖湘文化的继承和发扬》(《郭嵩焘与近代中国对外开放》,岳麓书社2000年版)试图阐述湖湘文化与郭嵩焘思想的关联,以湖湘文化精神反思传统,认为重义轻利是俗儒之见;郭嵩焘归国后,反复强调风俗人心为立国根本。王继平、史玉华认为,郭嵩焘文化人格的形成与他的家世、湖湘文化传统、西学的影响都密切相关。郭是一质朴率真之人,尊重自己的内心追求,入世情结非常浓厚。^①李长林的《郭嵩焘对西方社会的观察与思考》(《郭嵩焘与近代中国对外开放》,岳麓书社2000年版)认为,郭嵩焘承认世界上有八大文明古国,西方学问皆根源于希腊、罗马,冲破文化一源论,接受了近代意识文明观,将近代世界按其进化程度分为三个层次:文明,半文明,野蛮。郭认为只在物质层面学习西方是不够的,还必须从制度层面、思想层面学习西方。熊乡江《郭嵩焘与严复中西文化观之比较》(《求索》,2006年第5期)一文把郭嵩焘和严复的中西文化观作对比,指出两人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是一致的,两人都认为只有学习西方文化的精华,中国才能避免亡国灭种之祸。对于中西的政治思想、经济思想、伦理思想、教育思想两人有几乎共同的认识,都主张全面学习西方,批评了中体西用论。

第六,对郭嵩焘经济思想的研究。

丁轩、刘纯阳把郭嵩焘的经济发展观概括为:重利是前提,开放是条件,改良是动力,工商是路径。^②朱圆满所著《郭嵩焘眼中的西方财经世界》一文,研究了郭嵩焘在出使期间,广泛考察西方财政经

① 王继平、史玉华:《郭嵩焘文化人格论》,《郭嵩焘与近代中国对外开放》,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213页。

② 丁轩、刘纯阳:《论郭嵩焘的经济发展观》,《郭嵩焘与近代中国对外开放》,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72页。